

引導「自駕遊」衝破狹隘心理

□周八駿



知微篇

自2012年3月30日起，香港有關部門接受香港居民申請跨境到廣東省進行「自駕遊」。從兩地居民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跨境交往到開放兩地居民以私人交通工具跨境交往，無疑是標誌着香港與內地加深聯繫、推動融合的一個新里程碑。

然而，在香港，一些人反對這一項推進兩地居民交往的計劃；若干反對派人士更在本地報章撰文，鼓動在香港展開一場所謂「轟轟烈烈」的反「自駕遊運動」。

三年前已披露計劃

反對派人士反對「自駕遊」的主要理由是，這一項計劃從2008年底由港粵兩地政府共同作出決定到2012年3月正式開始實施，在長達三年時間裡，特區政府沒有諮詢香港居民。

這是一個歪理。因為，「自駕遊」計劃不是香

港本地一項重要公共政策制訂或修訂，而是屬於香港與內地加強聯繫、推動融合的範疇，後者自2003年6月底CEPA簽署以來，類似舉措一直是在兩地政府部門間磋商並適時向公眾披露，何曾在香港展開過公眾諮詢？

「自駕遊」計劃從決定實施到正式啓動，既然已花去了三年時間，便是早就為香港社會所周知；有人或有些人如果對此持有異議，早就應當公開發表或者向特區政府反映。所以，有人於今以「莫須有」藉口來煽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自駕遊」計劃啓動，純屬別有用心。

單向實施體現審慎

應該承認，如果不是當前香港一部分居民正被D&G事件、「雙非」孕婦來香港分娩所衍生問題等等困擾，那麼，「自駕遊」計劃正式啓動是會受香港大多數居民、尤其有車一族所歡迎的。過去三年，該項計劃從拍板到準備實施期間，香港社會一直沒有出現反對的聲音，便是有說服力的佐證。

然而，正是鑒於香港社會目前對香港與內地融合深化所必然產生的文化和心理「磨合」表現得不適應，粵港兩地政府經磋商決定：「自駕遊」第一階段，既是「單向」的，即只有香港居民可以到廣東省「自駕遊」，內地居民尚不能享有同等權益

；又是嚴格控制名額，即每日配額50個，車輛可以在五天內經深圳灣口岸進入廣東省一次，最多逗留七天。俟「自駕遊」計劃第一階段順利運行後，才研究何時落實第二階段計劃，即容許廣東省居民來港「自駕遊」，現階段暫無第二階段的時間表。

如果對於如此審慎的計劃都要反對和阻撓，那麼，香港社會某些人心理之狹隘便是到了「嘆為觀止」的地步了。

誠然，有些人是以內地居民到香港來「自駕遊」可能對香港交通安全產生負面影響為理由表示反對的。

適應不同交通規則

這樣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香港與內地的交通規則有差異，香港的車沿道路左邊行，內地的車沿道路右邊行，不習慣便容易發生交通事故。不無諷刺的是，即使香港居民到廣東省「自駕遊」也需要適應內地交通規則、注意交通安全，怎麼能夠單方面以內地居民到香港「自駕遊」可能滋生交通事故為理由來反對該計劃呢？

兩地居民相互適應對方交通規則，如同兩地居民相互適應對方文化和生活習慣，是香港與內地加深聯繫、拓展融合過程中必須解決也能夠解決的課題。粵港兩地政府審時度勢，以十分審慎的態度開

始推行「自駕遊」，香港有些人連這樣的舉措都反對，他們自我封閉的心態，與新世紀全球化開放形勢是大過脫節了，與香港必定融入國家的大趨勢則是完全相悖的。

公民黨又一次站到了反對「自駕遊」計劃的最前列。2月16日，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以大多數通過關於推行「自駕遊」第一階段計劃的動議後，數十名公民黨成員包括黨魁梁家傑，隨即在特區政府總部大門外舉行抗議活動。反對派伺機一再阻撓或反對香港與國家主體加深融合，是因為他們明白，香港越是依存於國家，他們在香港反對國家的力量就越虛弱，香港政制發展就越不可能偏離「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指引的方向。

政府引導十分重要

特區政府以十分審慎的態度來啓動「自駕遊」計劃，這是應予肯定的。但是，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對於香港居民的引導以配合和推進香港與內地融合。不能不指出，從D&G事件到「雙非」孕婦問題再到「自駕遊」，特區政府固於傳統觀念，引導工作是做得不夠的。鑒於香港媒體和公民社會都缺乏強有力的正確的引導，特區政府義不容辭，必須承擔起對於香港前進和發展的引導。

「自駕遊」是全世界一種普遍的旅遊方式，在內地早已蔚然成風。香港只是一個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香港居民更應當懷抱走出去享有「自駕遊」樂趣的願望。如果一直自我封閉在這局促之地，香港人的心胸怎麼可能擁抱整個世界？這樣的社會心理怎麼能夠與國際大都會的地位相稱？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公器私用

保龍

彭清華三建議促兩地融合

□曹宗興

這三點建議，不僅對於化解當前出現的兩地矛盾至關重要，具有指導性作用，而且更着眼於長遠，力求從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從兩地融合的大格局出發，從融合產生矛盾的深層次上作出努力。如果這三點建議都能獲得良好落實，可以相信，隨着融合的不斷推進，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指點香江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昨日在港區人大代表小組會議上發言，針對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兩地融合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現象，提出了三點看法和三點建議。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與內地融合是大勢所趨，在兩地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需在發展過程中解決。他建議，要正確看待兩地差異、尊重港人生活方式；妥善處理偶發事件，理性做好疏導工作；創新兩地合作機制，切實加強溝通協調。

可以說，這三點建議，不僅對於化解當前出現的兩地矛盾至關重要，具有指導性作用，而且更着眼於長遠，力求從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從兩地融合的大格局出發，從融合產生矛盾的深層次上作出努力。如果這三點建議都能獲得良好落實，可以相信，隨着融合的不斷推進，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因此，對於所有關心國家、關心香港發展的市民來說，彭清華主任的這三點建議，都值得認真反省與思考。

兩地交流不走「回頭路」

近期，兩地關係發展發生一些風波，包括「蝗蟲論」、「狗論」，以及「雙非」、「自駕遊」問題等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一些人士對此給兩地交流合作帶來的負面影響感到擔憂。一些反對派更以為藉口，大肆鼓吹「兩地不可融合論」，意圖阻撓這種交流合作的大趨勢。

一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兩地融合是大趨所趨，而且更是香港賴以持續發展的關鍵。事實上香港回歸祖國已近十五年，兩地融合正不斷朝廣度、深度上推進，香港市民普遍對

此更是抱着歡迎以及樂享其成的態度。早前一項調查更顯示，大多數市民希望這種融合進一步推進，持相反意見的僅是極小部分。而回歸十五年來的實踐更證明，不論是經濟發展比較順暢的時候還是遇到困難的時候，加強兩地交流合作都是抵禦風險、互利共贏、謀求更大發展的推動力量。這既是香港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發展的需要。

而之所以會發生一些摩擦與矛盾風波，有其歷史和現實原因，是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應該客觀看待。一如彭清華主任所指出的，一是由於我國地方人多，風俗、習慣、制度各有不同；二是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在兩地交流頻率極高的情況下，出現一些小摩擦不必大驚小怪。

香港從來都不是靜止、一成不變的，香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還要在發展過程中解決。彭清華發言中為此提出的三點解決問題的建議，極具針對性，也是可以分階段經努力後能有效解決的方法。

着眼長遠及時溝通解決

正確看待兩地差異，尊重港人生活方式。這是從深層次分析矛盾產生的原因，許多人一方面贊成兩地經濟融合並從中受益，一方面又擔心被同化，喪失原有價值。這種心態回歸前就存在，並且趨嚴重。但從根本上而言，兩地融合並不涉及根本方針、制度和法律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看待兩地差異、求同存異的問題。絕對不是反對派口中所說的「不可化解」、「水火不容」的制度性原因。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正確看待兩地差異，並抱以尊重港人生活方式的心態，一些摩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需要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國人的共同努力。

「溝通」可緩解行政立法矛盾

港事港心

行政和立法有必然的矛盾嗎？有人說香港行政和立法的關係不好，認為基於政治原因，立法會議員向政府的提案投反對票，導致立法程序阻塞。但行政和立法有基本的矛盾嗎？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職權包括對政府工作提出質詢，和就任何有關公共問題進行辯論；基本法同時規定，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草案必須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些內容確定了香港行政主導的政府體制。

公共事務程序重要

議員有吸引選票動機。在正常的情况下，這符合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利益；同時，投票支持有益於政府的政府法案，應該也符合議員的政治利益。

如果政府的提案正確和看上去是正確的，立法程序應該運作暢順。在公共行政事務上，程序非常重要。一個政策提案的正確性必須透過辯論和討論得以展示，令公眾清楚明白它的好處與壞處。這種情形跟商界的董事局大不相同：一般的公司行為只需要足夠的票數，討論往往是不必要的，並且可能不是建設性的；而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而言，與持份者討論是必須的。政府必須有能力去克服異議並且排除恐懼和躊躇，並需要勇氣去接受修改和建議，改善提案。一旦官員正確地掌握問題的核心和提案的原委，他們就有信心和持份者對話。因此，就算有充分的票數保證政府提案通過，政府也應該徹底辯論提案，以便可以聽到不同的意見，而且保障持異議人士的觀點可以表達。只有當社會各方面都了解並確信某個政策，該政策才能有效地推行。當大部分香港人相信政府的提案是正確的，立法會議員便沒有理由投反對票，因為這並不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

我認為目前的體制是可行的，但其可否改良則是另一個問題。體制的改變需要修訂基本法，不可以輕率啓動。即使體制完美，配以不稱職的人，也會運作不好。另一方面，即使體制並非完美，配以勝任的人，也有機會運作良好。

□余永賢

為什麼香港目前行政和立法的關係不好呢？一個原因是溝通不夠。一方面，商人理解在公共事務上對話和溝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殖民時代訓練的官員習慣依從上級的指令，他們從未意識到諮詢持份者的必要性，也不習慣謙敬於持份者。

此外，最被人詬病的是社會上有關公共政策的討論水準低劣。有些人把這歸咎於政府缺乏溝通技巧，其實是官員沒有適當地掌握和了解問題。當事人缺乏對問題的理解，公關公司也幫不到什麼。帶領討論及設定議程是政府的責任，但是缺乏對問題的了解便使政府不能發揮領導者的作用，於是時常讓媒體解剖議題，使得政府從主動淪為被動。社會有時因為低水準的討論而責備媒體，其實應該責備的是沒有擔當起領導者角色的政府。

「解釋政策」政府有責

向社會公眾提倡新理念與在市場推銷產品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商人投其所好，如果買方僅僅被食物包裝的顏色所影響，商人就沒有需要注意食物的營養價值。但在公共政策上，政府有責任向市民全面解釋政策的含義，單靠滿足某些組別的喜好來確保政府立法的通過並不足夠。社會各方面都應該明白政策的理念和根據。

如果政府對問題沒有徹底理解，就需要非常僥倖才能制定正確的政策提案。把以前行使的政策微調小修，變成可見人的政策提案就不困難。當政府的政策提案不適當或者明顯錯誤，就不能期待在立法會受到歡迎。

政府可以把辯論帶領向一個建設性的理性討論，但也可以挑撥既定理念的對立。當一些派別被分化到為對抗而對抗的時候，理性討論就會減少，這就會掩蓋政府對議題的無知。因此，製造反對也有鞏固支援政府的效果，這就像一個國家有時需要外來敵人來鞏固內部團結並且轉移對國內不足的注意。由此可見，製造衝突也是讓政府顯得似乎忙碌的方法，可將注意力從政府缺乏積極行動轉移到其他方面。

作者為應用科技研究院顧問

強勢普京對中國更加有利

□吳非

中外連線

2012年3月5日，普京以63.6%的得票率宣布當選俄羅斯總統。這一得票率反映了俄羅斯民衆的普遍心理——擺脫蘇聯解體的陰影，擺脫美國和阿拉伯之春影響。普京需要協助俄羅斯恢復昔日的光榮，儘管俄羅斯還存在普遍的貪腐，但普京敢於和西方唱反調，表明其本身應該沒有貪腐，沒有錢存在瑞士，否則西方哪能輕視過普京。

一些媒體認為普京呼風喚雨的時代過去，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因為如果俄中在未來五年內沒有在地緣政治上進行聯合，那麼，美國和西方採取各各擊破的方式，屆時俄羅斯如何保持普京留下的輝煌，中國如何開拓內需，讓中國模式保持光彩。俄中關係需要感情的維繫，而不是不斷質疑、反問、算歷史帳。俄中關係緊密，才會有效遏制美國重返亞洲。弱勢的普京對俄中都沒有好處。

亞洲盟友不多

普京自2000年任總統的八年間，政績不可謂不突出。但在亞洲政策方面，普京的政績幾乎沒有，甚至連最基本的亞洲戰略框架都看不到。問題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普京周邊的智庫幾乎都以歐美為主，而普京在整體國家戰略發展上也以歐美國家為着眼點，這使得普京在思考亞洲戰略時經常欠缺人才的支援。俄在亞洲的外交官經常不是普京的核心人物，而這些人熱衷於被他國招待，使得普京的亞洲政策變為

「沒有政策」，決策遲鈍。

俄羅斯本身在亞洲的盟友並不多。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在目前狀態下還算是可行，但問題在於印度在蘇聯時期購買了大量的武器，這些武器款項在蘇聯解體之後，被意外勾銷了。印度在發展過程中也非常重視來自俄羅斯的技術專家和相關的實用性技術。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印度和俄羅斯國家的關係緊密，而是印度需要一定數量的俄羅斯專家和技術來推動發展。

越南也非常重視來自俄的武器裝備，對於俄的其他作用，卻非常忽視。越南現在利用金蘭灣軍港不斷向俄美拋媚眼，拉俄美形成對中國最大的壓力來獲利。但只要俄中在地緣政治合作，越南的空間就會消失。

存在三個問題

俄中在基本的合作上存在三個問題：首先是基礎研究不足。對於俄羅斯的文化，在中國基本只介紹到沙皇俄羅斯和蘇聯階段，對於現在的俄羅斯狀態，只有國際關係和歷史類的學者介紹比較多一點，其他領域則是非常少；而俄羅斯更是可笑，連關於中國發展的基本資料庫都沒有，使得俄東方科學院的院長去年就上書總統和總理，希望增加投入。

其次，俄中關係在政治上的互補性強，經濟的互補性較弱。政治互補強是因為中國需要不斷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來警惕內部出現任何問題。中國高層的共識是在政治上參考西方經驗，這會使得判斷不準確。而蘇聯的經驗和中國比較相似，脈絡清楚。俄中經濟冷，主要是俄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個資源輸出的國家。俄中在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幾乎很少

，基本上都是俄羅斯高科技向中國流動，中國向俄羅斯的流動幾乎沒有。另外，俄羅斯內部市場並不對中國開放，中國商人基本依靠灰色通關。自普京在2010年打擊集裝箱市場之後，中國商人在俄羅斯的生存已經非常艱辛。

俄中在國際關係上的戰略合作較少，兩國口頭上的協定比較多，但落實則欠缺。俄熟悉亞洲事務的官員中，其意見能夠經常直達普京的人員較少。中國這方面的人比較多。這往往造成中國方面提出非常多的建議和方案，但俄方能夠落實的卻幾乎沒有。

拓展俄中關係

最後，俄中領導人需要互相理解。中蘇關係在六十年代交惡，這使得蘇聯領導人包括現任的俄羅斯領導人，存在心理陰影。一般中國媒體在描述中蘇交惡時，都在強調中國為受難一方，中國存在大量的委屈，其實蘇聯領導人自六十年代後也存在一定的陰影。蘇聯領導人不知道講什麼，不小心就會侵犯中國的文化禁忌。蘇聯領導人有一個最不好的習慣，總是喜歡指導別人如何做事，包括指導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這使得包括米利欽和普京在內的領導人，經常是不知不覺就不講了。

普京未來在亞洲政策的着眼點將會從地緣政治開始，但其中還存在大量需要補充的空間。俄中關係是俄羅斯繞不過去的課題。俄羅斯發展地緣政治，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包括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航運，如果沒有中國出口港包括香港、上海、廣州、天津的港口和中國遠洋運力幫忙，單憑東南亞國家日本、韓國的幫忙，這條航線成爲主要航道的周期還會很遠。

作者為暨南大學教授，察哈爾學會研究員